

以牧者心腸要求召開梵三大公會議

關傑榮

對生活持樂觀態度的人，世界的確比從前進步得多。對性格悲觀的人、尤其是宗教界人士，世風日下，道德敗壞才是今天的真相。大神學家德日進神父的道德進化論到今天仍極具爭議性。的確，整個人類已經擺脫了事事依賴權威的嬰兒階段，亦克服了青少年做事那種漫無目標、隨感受支配抉擇的不成熟行爲；大家一起步入成年肯負責任的現實。然而以世界視爲一個整體，以上的讚譽又似乎有點言過其實，我們並不如期望般成熟。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，差不多全人類都發誓以後不會再挑起殘酷的戰爭；但現實告訴大家，各地的戰火從未熄滅！

梵二公議會前幾百年，天主教爲了維持一統，好能跟基督新教抗衡，我們幾乎把「聖經」雪藏起來。做事有板有眼，一切以教律、教條及教規作爲行事宣教的準則；結果法律主義、教條主義和出世精神大行其道。教會儼然成爲世界道德生活的判官，與世俗劃清界線，與人類其他團體互動時顯得格格不入。可是後遺症影響深遠，特別是二次世界大戰期間，納粹德軍蹂躪全歐，趕盡殺絕猶太人和其他少數民族，而教會的「拯救行動」做得不夠積極，給人置身事外的錯覺；結果遭歐洲人民的唾棄，成爲世界舞台的「邊緣人」！教宗若望廿三世深明箇中玄機，知道如果繼續墨守成規，不勇敢面對現實，教會衰落危機將會深化。他一手策劃召開的梵蒂岡第二屆大公會議改變了教會的面貌……

坦白說，開會談改革容易，把決議付諸行動困難；這是人的一貫作風。我六十年代加入修道行列，既生活過舊的傳統，亦體驗了新的作風。那段日子，我心情興奮，對教會充滿憧憬，對前途滿懷信心……可惜四十年後的今天，自己比從前變得複雜及落寞。雖然仍舊熱愛教會，卻有那種「煉鐵不成鋼」的無奈感覺；因為梵二的種種改革並未完全落實，更談不上成功。人為怕變因素固然是首因，但推行改革的急進，沒有關顧到人的心理因素和承擔能力，也是失敗的原因之一。須知教會長久以來沒有什麼民主制度可言，而法律主義亦強橫地壟斷了信友的生活。那麼在人治情況下，你惟有碰碰運氣……

假如你的本堂神父從開始便認同及支持梵二公議會改革，並且在堂區悉力推行，那麼團體生活將較為活潑，教友的參與性較大，跟社區的關係也較密切。相反，如果牧職人員是抗拒改革的保守派人士，那情況便大大不妙了。禮儀生活是試金石，不少年青教友一腔熱情，去神學院進修，去參加禮儀生活營，目的是想提升團體的質素；可是無論你有什麼鴻圖大計，在堂區議會得到多大支持，只要本堂神父說不（Say No），一切又將原地踏步。其實有神職人員骨子裡排斥梵二公議會，只是不好意思說出口吧了，恐怕給別人冠以「保守」形象，追不上潮流。對其他宗教態度上的正面改變，也是梵二的卓越成就；不過現實生活，我們跟回教徒的關係仍然緊張和互相猜疑，跟其他宗教界人士的接觸，就算是基督宗派的交流亦流於官方形式。何解？因為梵二的革新精神並未落實到民間，未在一般信友心中紮根……

平心而論，許多出席公議會的教父們對教會誠懇的批評、對時代徵兆的洞悉，並提出自己精闢的見解，都只能停留在文字的層面裡；至於怎樣落實教育群眾和在現實生活推行，便往往顯得有心無力及曲

高和寡了。四百多年習以為常的生活模式，對已經信了的人，並無不妥，但針對福傳和仍未認識耶穌基督的人，能否接納就嚴重得多了；因為我們用的一套語言，現代人未必聽得明白。不讀聖經的現實是反省的好題材，事關我們喜歡把思維的工作交給神職人員，以為每個星期日彌撒中聽三篇讀經，然後再聽神父十來分鐘的道理便足夠認識天主。同樣心態，在堂區服務的前線神父，由於工作太忙，又把研究信理、倫理及聖經神學的責任推給修道院或大學的神學教授。結果大家的思考反省能力每況愈下……的確，神學是普及化了，但不少地方教會主教仍未放心，處處鉗制言論，不少念了神學學位的平信徒根本在教會圈子內沒有出路，更遑論受到重視了……

今天全球天主教會日趨保守，其成因實有跡可尋；因為世界變得真的太快，超出了我們的能力範圍。情況的嚴重比起二次世界大戰正邪對立、善惡之爭的局面更難駕馭。面對這樣的挑戰，通常會有如下兩條出路。一是勇敢面對，深究成因，尋找對策，轉危為機，接納改變，創新局面。二是抓牢傳統，護教為重，拒絕變革，中央集權，排除異己。教會面對「性醜聞」衝擊的反應是上佳的教材。起初逃避隱瞞，一口否認，到東窗事發，只知把罪責推到犯事人身上，曾幾何時，會有教會高層領導挺身而出，要求大家一起檢討沿用了好幾百年的「司鐸獨身制度」是否有修正的必要？許多修道人出道時滿懷理想，一腔熱情；然而「獨身」生活要求我們的「孤獨」打跨了不少人的心志，常常有人批評神父、修女、修士的性格古怪、脾氣暴躁，實在與修道生活的格局有關。再嚴謹的培育未必會出產更聖善的修道人，今天修道院對司鐸的培訓仍側重學術、其次是靈修；相比之下，人格成長的訓練仍有很大的發展空間。似乎我們採取了第二種面對困難的對

策。迴避多過面對現實，強勢統治以抗衡外邊千變萬化的花花世界……

梵二公議會後，改革的成績強差人意，有些根本未能滲入信友生活。比較極端和嚴重的個案莫如法國主教拉菲全盤否定「梵二」，自己另起爐灶，誓要保著梵二前教會的神聖傳統。不必說「拉丁文」彌撒照舊，連祝聖主教和晉升司鐸也脫離了教廷梵二後禮儀改革的指引，我行我素；而幾任教宗也奈他不何，軟的規勸，硬的要脅趕出教會，但也是說話多過行動。如果大前題我們肯定所有公議會都在聖神光照下進行及完成，那「梵二」當然不能例外；可惜現實告訴我們，教會領導人會持雙重標準，對思想言論前衛和開放的神學家毫不客氣，特別是那些挑戰批評教會權力架構的人。一是剝奪他們在神學院教書的機會，二是禁止他/她們在公開場合發表言論。三、也是最嚴厲的做法是趕他們出教會，即「絕罰」(Ex-communication)。然而對極端保守的人士，卻表現得非常克制和容忍，這種心態究竟顯示了什麼？聰明的讀者是會明白的。

再回到平凡、但實際的堂區生活，梵二精神仍多停留在理論層面，未能在民間紮根。舉個簡單例子，梵二後「聖事神學」對「聖事生活」有了更全面和廣泛的了解，因為我們以「聖經」作為反省的基礎，加深了大家對感恩祭彌撒和告解修和聖事的認識。既然彌撒除了祭祀，即人向天主的縱面崇拜，人的橫面團體幅度亦非常重要。是以梵二禮儀改革後，聖堂內的橫祭台——那些從前供神父們自己一個人獻祭的祭台給拆毀了，代之是「共祭」的興起，因為我們明白，感恩祭是應該在團體內完成的神聖宴會，而非一人自己跟天主的親密交往。社交宴會，被邀者尊重主人家，一定盛裝赴會；這意味著沐浴更

衣，清潔一番。上述道理，香港的太太小姐們最明白……

在上述觀點下，梵二後的牧民神學一再提醒我們，善用彌撒開始時的悔罪禮。除非犯了大罪，當然要先辦妥當告解，才可以領受耶穌的聖體聖血；事關「宴會聖事」不應與「清潔聖事」同時舉行，因而產生基本矛盾及不協調。難道你去飲宴，快到魚翅上桌前叫停，再去清潔一下身體？無論怎樣，這是說不通的。然而在現實的教會生活，這情況的確存在。許多保守堂區，舉行彌撒時仍然安排神父聽告解，結果神父宣讀福音和講道時，你有你講，我有我去清潔靈魂。唯一稍為進步的是領聖體時暫停，事關有些神父今天仍不重視「送聖體員」職務，一定要神父送聖體才算數！噢，梵二梵二，在某些地方教會，你仿似難產的嬰兒，或因營養不良而長不大的孩子！這些年來，教會因「梵二」改革而滋生出來的問題仍舊未獲正視，世界卻急劇變化，我們面對挑戰的能力則不斷萎縮，我相信是時候……

沒有人敢否定大公會議是聖神的化工，包括教宗在內。不過聖神不會像媽媽那樣執著小孩子的手教我們寫字；人有「自由」去發揮。骨子裡，有許多神職人員不喜歡改變，也沒有興趣好好去讀通「梵二」文獻的精神，但又不敢公開反對，結果消極抵抗是最佳出路。亦要說句公道話，那些熱衷改革的人對教會目前「膠著」的境況同樣要負上責任。天主教的運作一向習慣由上而下，教徒多是順民，缺乏獨立思考、反省和批判的能力。一是對教會領導人頒布的文獻和發表的言論「照單全收」，然後地方教會領袖（主教）要求自己屬下的神職人員向教民下傳「聖旨」，忽視了實際環境的可行性和人的心理承擔能力。突然由一個極端去到另一個極端，叫人無所適從。梵二後修院的生活日程可謂天翻地覆，我自己是過來人。司鐸聖召是為人民服務的大前

題十分正確，但從前我們避世，因為怕俗世誘惑破壞聖召；所以回家省親，出外渡假的機會少之又少。梵二後，我們要走入群眾，與人民一起呼吸，結果呢？個個星期三都是 Day Off 假期，而神長們亦不知道應該怎樣輔導修生，安排時間，做事後評估等工作。後來我索性跟另一位同學，好「大隻」（強壯）的，在外邊找到份兼職運輸工作，替製衣廠落貨倉提貨。蠻有趣，又有錢賺，享受了一陣子「資本主義」的生活。可惜，亦有不少人離開了修道行列，事因無法適應這個急劇的轉變。既有人陽奉陰違，也有人在缺乏溝通、悉心教導的情況下強行推動改革，失敗可以預期！

是出席大公會議的教父和神學家的討論或研究功夫出了亂子？答案當然不是，倒是在六七十年代，全球都瀰漫著一種開放樂觀的情緒。政治圈子，美國的甘乃迪總統和馬丁路德金博士是表表者。宗教領域，我們的真福教宗、胖爺爺若望廿三世更給整個沉悶的世界、特別是天主教會帶來了一股清新的空氣、一份屬靈的希望。回想起來，那段日子，我是個對前途充滿憧憬、精力充沛的年青修士，我願意為耶穌……坦白說，梵二公議會不足之處，或更好說失敗的地方是大家犯了一個既普遍，又非常嚴重的毛病，就是「志大才疏」！志大是「先知」們早已洞察教會在現代世界身陷危機，如果不急起直追，我們分鐘會淪為地球的「邊緣人」，而這正是梵二的精粹所在；可惜才疏，因為在推行改革時，我們教會內部、尤其是高層領導、當然包括地方主教在內，缺乏社會心理學的知識和方法。想改革一個二千年的「老牌」組織談何容易，人的心理承擔因素必需得到正視。傳統給人安全感，改變充滿未知的危機。慢慢來，按步就班，人會接納。急就章，由上壓下來，結果是貌合神離，各走極端，我行我素。套用共產中國

的術語，要變革成功，一定先要向人民做妥「思想準備」功夫，道理就是這麼簡單！

我是個普通的堂區神父，每天接觸有血有肉、日日為口奔馳、願意按照福音精神生活，但又敵不過現實世界煎熬的教友。我服務的堂區大部份居民都是「勞動人民」，他/她們回教會尋找的是一份屬靈的安慰和體諒；生活遇到實際困難時，牧者能伸出援手，扶他們一把。每個主日，教友上教堂，是希望透過禮儀崇拜與天主相遇，並藉著聖言、聖體和神父的講道重新得力上路。可惜不少團體的禮儀常常流於刻板、機械化及禮規化，不是歌頌「愛」和「生命」的慶典。而司鐸的講道也往往太抽象和脫離現實，與群眾的生活不起共鳴。背後帶出來是什麼訊息？當然是司鐸培育一環出了問題，鬧聖召荒是有理由的。至於倫理道德生活，我們面對的挑戰更大。科研成就改變了人的生活面貌，可是教會的倫理神學未能追上這個勢頭。不少婚姻生活遇上困難的教友，仍在教規的「死胡同」裡浮沉，得不到適當的輔導，痛苦萬分。禁止用「人工方法」避孕已經趕了不少教徒出局，但可還有出路嗎？而 IT 資訊科技對我們生活的負面影響已日趨白熱化，我們又做了什麼抗衡教育的功夫？面對資本主義經濟體系的不公和剝削，教會又怎樣去關心了社會？生物工程的技術突破，複製人類生命的悲劇指日可待，我們又作了什麼部署及回應？

某次閒談，提及有召開梵三的需要，有些人的反應是何必勞民傷財，教會目前的境況蠻不錯嘛！其實我們有點兒「鴛鴦政策」。現實告訴大家，一向以西歐和北美作為信仰重鎮的傳統已經開始崩潰，我們只是吃著老本而矣。不要說好像上世紀初有那麼多傳教士「輸出」，就是今天連本土神職人員也嚴重缺乏，聖召危機天天深化。教會權力

雖然仍集中在歐洲，但興旺的信仰生活見證已經漸漸東移及南下。非洲、南美洲及東南亞諸國的地方教會日趨蓬勃便是最佳例證。拿香港作比較點，每個主日上教堂的人很平均，男女老幼都有；跟西方國家的堂區冷清情況對照，優劣分明。這樣下去，或有那一天傳教士出現「倒流」，大家要向西歐及北美傳教？鼓吹召開梵三不是意氣說話，而是肯面對現實的回應。為什麼上述地方教會的局勢那樣嚴峻，內裡一定有因。

梵二公議會結束後已經整整四十年，許多昔日提出的問題、對信理的闡釋、對某些倫理生活的指引等仍未落實跟進，許多人真的迷失了方向；不過更新的難題已呈現在我們眼前。教宗本篤應考慮再續未了之緣，召開梵三大會議。